

上饒市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上饶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上饶市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上饶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目 录

· 史 事 纵 横 ·

- | | |
|-----------------|--------------------|
| 以《民锋日报》为基地的地下斗争 | 石 岚 (1) |
| 苏联飞行员降落以后 | 俞西远口述、眭新亚整理 (10) |
| 战斗在武夷山区的志士 | 徐建中整理 (16) |
| 蒋经国在上饶的活动片断 | 田耕犁整理 (25) |
| 战时青年训导团简况 | 金 璞 (28) |
| 三青团上饶分团杂忆 | 王西华 (34) |
| 东南青年夏令营内幕 | 张国盛 (38) |
| 第三战区绥靖工作队始末 | 贡献之 (45) |

· 信 江 拾 零 ·

- | | |
|-----------------|------------|
| 日军劫掠上饶后点滴见闻 | 韩雨青 (55) |
| 上饶祝词中学杂记 | 王 风 (59) |
| 我所知道的上饶陶陶招待所 | 邓祖强 (63) |
| ✓ 耶稣教在上饶的概况 | 龚亨阳 (66) |
| 解放前上饶城乡纺织业的一些情况 | 刘瑞景 (70) |
| 解放初期上饶街头见闻 | 吕 品 (73) |

· 缅 怀 英 烈 ·

- | | |
|------------------|------------|
| 浩气长留天地间——陈龙标烈士传略 | 张学文 (77) |
|------------------|------------|

回忆史进烈士在集中营活动片断	邓毅生	(80)
缅怀李伯敏烈士	眭新亚、吴达民、戴雄远	(83)
胡正林烈士生平	胡庆沅	(90)
郑玉奎烈士简介	钟徐	(95)
短暂战斗的一生——忆邓复生烈士	李德盛	(98)

·人 物 春 秋 ·

昆虫学家杨惟义二、三事	张冠群	(102)
忆念郭静唐同志	童泉如	(106)
一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记姜献华同志的轶事	邓毅生	(112)

·时 人 佚 闻 ·

记刘世长的几件事	李菁峰	(124)
----------	-----	-------

·资 料 选 印 ·

战时青年训导团组织大纲	(128)
“中华民国”卅一年八月十七日内政部呈	(130)

·附录：历史名人 ·

韩老相公寓居信州	李德清	(132)
夏言宰相在广信	周林生	(144)
封二：江西省上饶专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照片）		
封三：政协上饶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常委合影（照片）		

史事纵横：

以《民锋日报》为基地的地下斗争

石 岚

我是一九四五年由重庆到中原解放区的。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原突围前，中原解放区党委派我到蒋管区工作，布置的任务是在蒋管区利用社会关系，开展革命斗争，发展革命力量。我到蒋管区后，先在我的家乡——河南巩县，工作一年多，我的公开职业是巩县师范教员。后来在那里有暴露的危险，我就通过一次税务人员考试的机会，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来到江西上饶城，我的公开职业是上饶专区货物税务局（后改为国税局）税务员。

上饶是国民党政府专员公署所在地，在这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张半民办的报纸——《民锋日报》（其版面和省级报纸一样大）。其编辑工作人员属聘请，不属政府人员。报纸由一董事会负责，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受“官方”（政府）的监督。我认为探明虚实，争取这个“舆论阵地”，这是开展地下斗争的有利条件，符合党给我的任务。我每天仔细地阅读研究这份报纸，发现该报国内外新闻一般采用中央社消息，无疑是反动的。而该报《牧野》和《春雷》副刊却经常发表一些进步诗文，因此，我认为这里可能有一些进步人士在工作。“以文会友”，“投石问路”，于是我就向《牧野》投稿，他们发表了

我的一些诗文。这样，我就认识了《牧野》文艺副刊的主编李耕和彭荆风，后来又认识了上海《大公报》驻上饶记者、《民锋日报》编辑主任汪啸琴。当时李耕是一个额头高高，眼窝微陷，目光炯炯的青年，他温文尔雅，有时又富于激情。彭荆风则是一个身材稍矮，沉默寡言的青年，当时他俩只有十七、八岁。李耕在省田粮处上饶聚点仓库当雇员（工人，管称磅秤等，有时看守仓库）。彭荆风在《民锋日报》当校对。相处久了，渐知道他们都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对文学有着深沉的爱恋和执著的追求。这是我在《民锋日报》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

另一面，仔细分析一下，《民锋日报》的内外处境，也是很险恶的。当时，这份报纸处在国民党上饶警备司令部，新闻检查处，军警稽查处，江西省党部第六行政区党务督导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暗藏的军统、中统特务分子的重重监视之下，而《民锋日报》内部以总经理石文山为头子的反动势力也是很强大的。石文山原系上饶军警稽查处副处长，陕西红帮头子，军统特务，又是专署军法官，处处控制着《民锋日报》。而总编辑胡植道，对石是唯命是从。所以在《民锋日报》开展革命工作，无疑是虎口拔牙，困难重重。但是从全国大局看，一九四七年十月，我解放大军已开始全国性反攻，“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震撼着全中国和全世界。这又是我们进行地下斗争的有利条件。

审时度势，根据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发扬“火力”，又要隐蔽阵地。我决定采取打“麻雀战”的方针。以《民锋日报》为基地，开展三个方面的斗争：一、通过李耕、彭荆风等把《牧野》、《春雷》办成进步舆论的阵地。后来李耕和我合编了《蜜蜂》副刊，李耕并主编了《每周文艺》；二、我自己尽可能在上饶、南昌、武汉、香港的报刊

上发表一些进步诗文，火力点多一些，影响就大一些，也便于“隐蔽阵地”；三、最根本的是要深入群众进行工作。我订了《观察》、《展望》等进步刊物，以及从香港的海洋书屋邮购一些解放区的进步文艺书刊，如《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王贵与李香香》和《大众文艺丛刊》等，在青年中进行工作。这就是李耕同志说的：“我在上饶和彭荆风同志一起办《牧野》副刊时，认识了一九四零年入党的地下党员石嵒，因此看到了很多进步书籍，才知道有个北方，有个延安，知道要从为文学而文学，走向文学为人民的道路。”（见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江西青年报》卓凡：《记忆的回音——访我省散文诗作家李耕》一文）。

生活在蒋管区的青年，由于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们思想上是苦闷的，犹豫彷徨，不知所措。对于偶尔得到的进步书刊，他们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热烈地讨论。如当时上饶中学的学生徐采樟、林观海、饶××等，我经常同他们谈国内外形势，借上述书刊给他们看，并订了《观察》、《展望》赠给他们。约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我曾暂时被派往税务局鹰潭税务所工作。在那里我同鹰潭税务所的卢学渊、江扬庭，鹰潭邮电局的张宗果及其妹张艳春等青年同志交上了朋友。同年六月，我调回上饶时，分别同他们进行了一次深谈，嘱咐他们“快解放了，好自为之，迎接解放”。我回上饶后又订了《观察》和《展望》分赠给卢学渊和张宗果，使他们受到教育，进步很快。据说鹰潭解放后，他们都较早地参加了革命工作。

革命形势的发展，鼓舞着我积极地投入战斗。一九四八年春，我在《民锋日报》上发表了《春天》一诗，象征着革命即将胜利，人民的春天即将到来。这首诗被国民党上饶行政专员齐振兴发现，进行追查和警告，幸汪啸琴力保才免于难。这一

时期，我也将革命的“投枪”，掷向敌人的营垒。《民锋日报》发表了我写的《有这样一个地方》，诗文曰：“太阳照着黑夜，晚上没有月亮……魔鬼是天神，天神是囚犯。”同时我也给南昌《中国新报》写了有战斗性的小诗、散文诗等。由于对蒋管区丑恶现象的憎恨，使我十分怀念解放区的战斗生活和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们。同时也使我深深感到全国即将解放，人民的春天即将到来。这使我满怀激情写了《祝福——给一个人》的散文诗，发表在《民锋日报》上。这一个人是一个年青的女战士，诗的结尾是“这个祝福给予你，也给予那一群盗火给人间的英雄”。显然，我是想通过这个女战士，来祝福我们激战在前线的解放大军的。这个女战士，就是我在中原解放区“民主建国大学”的同学，一九四七年在大别山战斗中被俘后跳崖壮烈牺牲的梁桂华同志。

后来，《牧野》副刊因发表朱兆瑞烈士以“朱门怨”的笔名写的讽刺诗《训练、训练》，而被党务督导处和警备司令部查问，同时被查问的还有李耕写的《赶墟》和我写的《冬天、冬天》一诗。因此《牧野》被停刊，彭荆风被解职，李耕也随之被粮库裁编，回了南昌，与以闽浙赣游击纵队城工部地下党员张自旗（陈夜）为主的革命青年，组织党的外围组织“荆棘文艺社”，并编辑党的地下文学刊物《人民的旗》。朱兆瑞则返回故乡瑞金，由于宣传马列主义及鼓动为解放事业斗争而被国民党杀害。这时，我也意识到发表革命诗文的危险，但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一时期发表在《中国新报》上的《飞蛾》一诗，则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情，我把自己比做一只在浓重的黑暗中，为追求光明而飞行的飞蛾，愿以自己的膏血助燃，而使革命的火焰烧得更旺。

约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民锋日报》进行改组，石文山调

走，周云蒸任社长，汪啸琴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周云蒸是个处世圆滑，八面玲珑的投机政客，不会公开对进步力量施加压力。李耕同志这时也通过南昌地下党张自旗的同意，从南昌回到上饶，正式到《民锋日报》社任编辑，斗争形势更加有利。因此，我们认为要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扩大阵地，深入斗争”的策略，战胜黎明前的黑暗，迎接解放。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通过汪啸琴，在《民锋日报》国内、国际新闻版，采用“见缝插针”和“挤”的办法，发表一些有利于革命的真实新闻。我们建议《民锋日报》和香港出版的进步报纸——《华商报》交换，这样不但使《民锋日报》社内的进步青年得到一些精神食粮，不断提高觉悟，而且可以将《华商报》刊载的真实新闻，加以剪裁改写，以“据外报传”的形式披露出来。反之，对中央社播发的有煽惑性的极端露骨的反动新闻，应想办法把它“挤”掉。一九四八年冬，在反动势力的干预下，《民锋日报》拟刊载污蔑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使用“人海战术”的报道。象这样的反动新闻则通过汪啸琴采取合法手段想法把它“挤”掉。

第二个措施是：组织《民锋日报》社内的进步青年秘密收听新华社广播，当然这是要冒风险的，要设法躲过特务的眼睛。“雄狮”部队军长刘雄，为了控制舆论，监视社内行动，就派中校特务赵亚东，打着“军闻社”记者的幌子，住在报社编辑部对面的屋子内。这个带着金丝眼镜的小白脸特务，经常在编辑部晃来晃去，有时在他的住屋内向外窥望，透过镜片，隐约地可以看到他那象毒蛇吐舌似地凶神的目光。但是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也盯着这个特务分子，站岗放哨，偷偷地收听新华社广播，并且在进步青年中互相转告，使大家精神上受到鼓舞。记得最使人兴奋的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秘密收听新华社广播我解放大军渡江的消息，收听完毕，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紧紧握手致贺。

一九四八年冬，李耕同志主编《每周文艺》，又和我共同编《蜜蜂》副刊。据李耕回忆，这两个副刊出版后，《春雷》即停刊。记得《蜜蜂》副刊的刊头，是李耕请南昌画家周明珏画的，《蜜蜂》的发刊词是我写的。大意是：这是冬天里的春天，飞舞在花丛中的蜜蜂，以她嗡嗡之声安慰着人们的心灵。她以甜甜的蜜汁哺育着人民，她以毒刺向敌人进攻。这个副刊的宗旨不言而喻是很明白的。《蜜蜂》每星期五一期，《每周文艺》逢周末出刊。这两个副刊的作者有丁力，唐湜，莫洛、李一痕、罗蓬、草风、矛舍、简范等。他们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民盟地下盟员。

这个副刊大概出了三、四个月左右，就因刊登一首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小诗而被迫停刊。这首小诗的题名是《小镗锣咣咣》，其中一节是：“小镗锣咣咣，乡长老爷下了乡，凶似虎，恶似狼，过去为了打日本，而今为的啥名堂？！”这首诗原是武汉某报发表，我剪下备用，而由李耕同志编发的。

发表这首小诗的当天上午，约十时左右，我从上饶火车站回税务局，刚走出车站，就看见李耕同志坐在一个小茶馆里，面色通红，略露惊慌，他一看见我，就急忙叫：“石嵒，来，来！”说着就走了出来，我俩走到一个街角僻静处，我忙问：“什么事？”他说：“糟了！《小镗锣咣咣》那首诗，被宪兵团魏团长发现，说你一定是共产党，正在追查。”我听后，心里一惊，但故做镇静地说：“我又不是共产党，怕什么？”当天晚上，税务局长刘肯堂在他家请客，我也被邀请了去。吃了几杯酒（我原不会吃酒，这时吃几杯便于掩护），约晚上九时，我又面色通红，满身酒气地走进《民锋日报》社。因为平

时经常去，若这天忽然不去了，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这时我的眼前又晃动着赵亚东那透过白色镜片的审视的目光。我在报社谈笑风生地玩了一个多小时，才回税局。但心中却作了准备被捕的打算，悄悄地把我房内存放的解放区的书刊烧毁了，准备万一被捕后敌人的拷打和审问……。

解放后得知，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在刘雄、赵亚东的密谋策划下，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就给张雪中（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兼该总司令部上饶指挥所司令）下了一张逮捕“匪党嫌疑分子”韩石岚等七人的黑名单。后经由南京撤来的国防部主任秘书王懋生做保，张雪中才暂缓下手。这次《蜜蜂》事件发生后，刘雄凶相毕露，联合张雪中，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上饶戒严司令部的名义，硬说报社有“匪党活动”，扬言要封闭报馆，逮捕“匪党分子”。给《民锋日报》扣下“破坏戡乱”“污蔑总统”“散布匪化言论”等几项大罪。最后因抓不到事实根据，罪名不能成立，我们才免于被捕。但是，他们又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汪啸琴担保我不得离开上饶，二、《民锋日报》要对此事进行处理并见报。于是《民锋日报》登了一个启事：“×月×日本报言论失检，社长、副社长各记大过一次，副刊编辑韩石岚撤职。”

李耕同志因涉及《蜜蜂》事件，他主编的《每周文艺》也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上，李耕写了《再会吧，朋友》一文，记得前面的两句是：“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时辰，荒淫的地盘在动摇，黑暗的地狱在崩溃”。

两个文艺副刊都被扼杀了，但斗争并没有止息。李耕一方面在报上登出“离开上饶”的启事，一方面则以“本报记者”的名义，用子冷、巴岸、卜云、于娴、易寒等笔名在《民锋日报》上发表短篇特写，如《贫穷使人卖笑》、《夜上饶》、

《上饶“繁荣”了》等，深刻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阴暗面，启迪人民的觉醒。李耕同志并利用报社主办的文艺晚会朗诵革命诗歌。

在杀气腾腾白色恐怖袭来的时候，有人好心地劝告我，不要再写东西了，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我想解放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革命战士，能偃旗息鼓吗？不能！我不再以“石嵒”的笔名写诗文了，得到汪啸琴的帮助，我给《民锋日报》写社论和政论性的文章（署名：本报评论员），在当时的可能条件下，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反动和黑暗。记得一九四九年我给《民锋日报》写的元旦社论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说明从国共双方看，战争是一定要打下去的。我以极兴奋的心情写出这篇社论后，已到深夜，交汪啸琴看后就发排了（版面是事先留出的）。一九四九年春天，我还以“吕怀”的笔名，在我党地下组织闽、浙、赣游击队在南昌秘密编辑出版的地下刊物《人民的旗》（由张自旗、李耕主编）上，发表了《论诗歌大众化》一文，强调诗的艺术性和战斗性相结合，要歌颂工农的革命斗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反对脱离现实斗争的为艺术而艺术。

记得那时税务局门前有一条大道直通火车站，离税务局不远斜对面的街上有一家小茶馆，是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楼板很旧，有的地方已经腐朽。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地响，要小心翼翼。楼上摆着油漆剥落的方桌、长桌，也有几把竹椅和方凳，窗棂虽已乌黑破旧，但推开窗子，还是很明亮的。这里只有早上是热闹的，除茶外，还有油条、炒葵花籽、清明果（一种笼蒸的用糯米和清明菜做的粑粑）卖，人们熙熙攘攘，来喝茶吃早点。但到上午九时左右，茶馆就没人了。我常常买一杯茶，几个清明果，或一小盘葵花籽，泡半天，在那里写文章是很清静的。我当

税局查验员时，往往是到火车站转一转，就又回到茶馆写文章了。一九四九年二月，税务局长刘肯堂要我代理人事室主任，我认为这符合地下斗争的原则，“爬得高、站得稳”。一方面便于掩护革命工作，一方面把人事档案保存好，便于解放后接管，于是便答应了。这时我更自由了，不用到火车站查税票应付差事了。人事室的工作由两个办事员办理，我只签字罢了。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茶馆里写文章了。可以说，我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诗文，绝大多数是在这个茶馆里写出来的。因此，在今天写回忆录时，不能不提到它。

在上饶解放前夕，汪啸琴告诉我，周云蒸想把报社搬到蒋管区别的地方去。我告诉他要说服周云蒸，全国都要解放，只有迎接解放才是出路。经过一番曲折，《民锋日报》及家底还是保存下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上饶城解放，《民锋日报》由我解放军接管，改组为《赣东北日报》（赣东北区党委机关报）。随之我们参加了进军大西南的行列，结束了以《民锋日报》为基地的地下斗争。

苏联飞行员降落以后

俞西远口述，眭新亚整理

一九三八年夏，保卫武汉的战斗已揭开序幕，当战斗尚在远离武汉三镇的外围地区进行时，武汉上空继“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三次空战大捷之后，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八·三”空战。我国空军部队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配合和支持下，一举击落敌机十二架，揍得日军空中飞贼晕头转向，铩翼而归。就在这次空战的同一天，在赣东弋阳地区发生群众自发营救苏联飞行员的动人事件，谱写了一曲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凯歌。

苏联空军志愿队系于一九三八年夏由苏联人民派遣来华，援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他们和中国人民一道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创立了无数的英雄战绩。他们以武汉为基地，曾英勇地远征台北，猛烈地轰击过入侵长江的敌舰，并顽强地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联军的疯狂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在激烈的空战中，有许多名志愿队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们的鲜血和中国人民的鲜血溶结在一起。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对无私援助我国抗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勇士们，怀有深深的崇敬和友好的感情，弋阳地区人民群众营救苏联飞行员的行动，正是这种感情的具体体现。当时，我们在弋阳县动员委员会宣传工作团的同志目击和参与了这一营救行动，至

今记忆犹新，现根据记忆所及、追叙如下：

一、碧空机影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这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宣传团的几个同志吃了早饭后，聚集在驻地弋阳小学的一个空旷的教室里研究工作。刚刚坐定，天空隐隐传来嗡嗡的飞机马达声，当时，弋阳是个没有任何军事设施的小县，西距武汉近千里，东距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所在地皖南重镇屯溪也很远，敌机偶尔飞越弋阳上空，都是一飞而过，从未进行盘旋轰炸。我们这些流亡青年，是从敌机炸弹窟里闯过来的，掌握了敌机施虐的行动规律，胆子也练大了，不轻易躲警报。可这回却有点蹊跷，机声久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响，为了弄清飞机的动向，我们走到窗口窥察，眼尖的同志首先发现目标：“看，一架！在那边！”我们顺着他的方向瞧去，果然看到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机身歪歪斜斜，倾侧得很厉害，一会儿，这架飞机晃向火车站的方向，发出一阵俯冲似的巨大的声浪，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我们派小张同志出去打听情况，其余同志坐回桌旁继续研究工作，过了四十多分钟后，小张气咻咻地从外面奔回来，一进门就大声嚷道：“掉下了一架苏联飞机，三个飞行员跳伞！”我们震惊得霍地站起来，齐问：“人呢？”小张抹了一把汗，喘着粗气答道：“没事！我们和群众一起救了他们，安排在车站休息。”

我们立即集合了十几个同志直奔火车站。

二、友谊的桥梁

这是一个三等站，站台很小，候车室旁有间小站房，当我们赶到时，车站外面黑压压地拥了一大堆人，有宣传团的几个

同志在人丛中维持秩序，为了保证苏联飞行员的安全，不让群众随便进入飞行员的休息室，苏联飞行员安静地呆在站房里，久久没有露面。我们猜想，大概是志愿大队内部作了纪律交待，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事端，破坏中苏友谊，飞行员除与国民党官方接待人员接触外，一般不公开露面。可宣传团的同志却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希望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和苏联空中勇士见见面。但怎样才能取得飞行员的了解和信任，并愿意和我们接触呢？宣传团的嵇仲虎同志想出一个主意：“我们大家来唱《祖国进行曲》”！对，这是一支苏联人民非常熟悉和爱唱的歌。抗战前夕，在我国流传很广，成为我国进步青年最爱唱的苏联歌曲之一。它那充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感情的歌词和旋律，可以成为沟通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桥梁。于是，在场的宣传团男女团员一齐引吭高唱：“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雄浑的歌声响彻了车站上空。不一会，在站房的窗口，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苏联飞行员，年纪约摸二十七、八岁，上身穿着一件被汗水湿透，沾有泥渍的衬衣，脸上露着惊异和兴奋的表情，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室内没有露面的两个苏联飞行员，也被我们的歌声和掌声吸引到窗口。他们兰色的眼睛里闪着激动的泪花，三个飞行员情不自禁地合着我们的节拍，用俄语低声和唱，两种不同语言的歌声，融汇成一片友谊之声的海洋。

歌声渐渐停止，我们宣传团的四、五个同志在得到苏联飞行员的默许后走进他们休息的站房。面对着这些舍生忘死，不远万里来支援我国抗战，在中国天空浴血奋战的苏联飞将军，我们感到有很多话要向他们倾吐。但双方语言不通，无法对话。有一个同志试用刚学会的世界语向他们表示问候，可由于发音不准确，客人们没有听懂，同志们随机应变，把会话改为笔

谈，性急手快的小孙同志首先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写了一行世界语：“这里在一九三三年属于中国苏维埃的一部分”，为首的苏联飞行员显然看懂了，但他反应谨慎，表情凝重，没有作答。另外两个飞行员也没有吭声。当时，我们还不太理解，现在才领会到他们身处环境复杂的国统区，为了避免给某些怀有敌意的人留下反苏的话柄，对这个敏感的问题不能不保持缄默。当时，我们还年轻，有着“左倾”幼稚病，竟没有想到这一点。

三、英勇出击，负创飞行

这时，我们宣传团的团长同志，借车站电话向弋阳县国民党县长张××汇报情况，张县长已从南昌空军基地方面得到消息，苏联空军志愿队在黎明时英勇出击，轰炸安庆的敌机场和闯入长江中游的敌舰，在胜利返航时，有一架苏联飞机中了敌弹，负创飞行，在弋阳上空坠落，机上四人，一人壮烈牺牲，三人跳伞。县政府按南昌基地的紧急通知，正在设法寻找跳伞的苏联飞行员的下落。

张县长听了我们汇报后，派了一名秘书去车站看望苏联飞行员，秘书代表县长邀请苏联飞行员去县政府休息，客人们用手势表示已经打电话向南昌基地联系求援，不准备转移地点。正好这时南昌方面派来的翻译也赶到了。在东道主的热情邀请下，苏联飞行员终于接受了邀请。由我们大家簇拥着前往县政府。

消息传开后，轰动了弋阳县城，街头巷尾，茶馆店，都在谈论着这件动人心魄的大新闻。

第二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引用国民党中央社电讯，报导了这次苏联空军志愿队英勇出击的详情：“昨晨，我